

说莫言 上

林建法◎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莫言

说莫言 上

林建法◎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 林建法 20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说莫言 / 林建法主编.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205-07522-4

I. ①说… II. ①林… III. ①莫言 — 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1593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 刷: 沈阳市奇兴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43.75

字 数: 744 千字

出版时间: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时祥选 刘国阳

装帧设计: 丁末末

责任校对: 郭大方 姚飞天

书 号: ISBN 978-7-205-07522-4

定 价: 80.00 元 (全两册)

法律顾问: 陈光 咨询电话: 13940289230



莫言说：诉说就是一切

影响的焦虑	莫言	002
中日作家鼎谈	铁凝 大江健三郎 莫言	007
向中国古典小说致敬	莫言 李敬泽	024
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	莫言	032
小说与当代生活	莫言	038
文学个性化刍议	莫言	039
当历史扑面而来	莫言	045
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成就奖”授奖词及获奖演说	莫言	048
诉说就是一切	莫言	051
翻译家功德无量	莫言	054
文学应该给人光明	大江健三郎 莫言	056
类妖精书	莫言	066

——《摇曳的教堂》序

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	莫言	069
——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		
从《红高粱》到《檀香刑》	莫言 王尧	076
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	莫言	094
说说福克纳这个老头儿	莫言	099
清醒的说梦者	莫言	101
——关于余华及其小说的杂感		

说莫言：叙述的极限(上)

面对历史纠结时的精准与老到	栾梅健	106
——再论莫言《蛙》的文学贡献		
“现代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	刘再复	117
——《酒国》、《受活》、《兄弟》三部小说的批判指向		
喧哗与静默	王安忆	122
重新拾起“人的忏悔”的话题	罗兴萍	137
——试论《蛙》的忏悔意识		
本土性、民族性的世界写作	刘江凯	150
——莫言的海外传播与接受		
莫言作品英译本序言两篇	〔美〕葛浩文 著 吴耀宗 译	168
和善先生与刑罚	〔德〕汉斯约克·比斯勒-米勒 著 廖迅 译	175
时代的书：你几乎能触摸一个中国农民的“二十二条军规”	〔美〕白礼博 著 林源 译	180
“历史一家族”民间叙事模式的创新尝试	陈思和	183
人畜混杂，阴阳并存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	陈思和	201

重生	[美] 史景迁 著 苏 妙 译	215
——评《生死疲劳》		
莫言：欣赏美丽的“误读”	江 湖	218
莫言：与鲁迅相逢的歌者	孙 郁	220
魔幻化、本土化与民间资源	程光炜	230
——莫言与文学批评		
莫言的“变形记”	黄发有	248
天马的缰绳	张清华	263
——论新世纪以来的莫言		
不驯的疆土	李 静	278
——论莫言		
论《天堂蒜薹之歌》	[英] 杜迈可 著 季 进 王娟娟 译	297
“胡乱写作”，遂成“怪诞”	王者凌	307
——解读莫言长篇小说《生死疲劳》		
复苏民间想象的传统和力量	王光东	318
——由莫言的《生死疲劳》说起		
寻找一种叙述方式	郭冰茹	324
——论莫言长篇小说对传统叙述方式的创造性吸纳		
叙述就是一切	周立民	332
——谈莫言长篇小说中的叙述策略		

苦行说：
诉说就是一切
SUSHUOJIUSHIYIQIE

影响的焦虑

莫言



关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说法，已经有十几年了，但在过去的日子里，这说法也仅仅是个说法而已，对老百姓，其实并无什么具体的影响，或者说，大家并未感受到什么影响。但现在不一样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已经席卷全球，自然也影响到中国的普通百姓。美国一感冒，全球打喷嚏。在这样的暗淡岁月里，讨论文学，也许正是一个好时机，因为好的文学大多不是兴高采烈的产物，因为好的文学，大都是沮丧心情的产物。

前几年，知识分子们更为担忧的似乎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全球文化趋同化，这里边自然包括了全球文学的趋同化。二〇〇三年六月，我与王安忆在上海图书馆联合做过一次演讲，题目叫作《悲壮的抵抗》。抵抗什么呢？抵抗的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全球文化趋同化。我在那次演讲中举过一个例子，说全球大约有七千种语言，但正以每两个星期一种的速度消亡，而且消亡速度会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交通的便捷而不断加快，用不了多少年，地球上大概就没有多少种语言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应该是件好事，但从文化和艺术的角度看，这是巨大的悲哀。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要以牺牲文化的多样性为代价，这样的经济繁荣，绝对不是人类的福音。而现在看来，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似乎也不是什么好事。但现实是铁打的，不是我们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在经济问题上，我们只能逆来顺受，但在文化和文学问题上，我们还可以表达一下个人的想法。

随着科学的日益进步和交通的日益快速便捷，过去要几个星期、几个月才能办到的事情，现在瞬间即可完成。几十年前，中国人去一次美国或者欧洲，还是一件隆重得似乎可以写进自传的大事，但现在已经成了寻常小事。这样的背景，为时尚的传播和流行提供了条件。二十年前有人曾经就服装流行作过研究，说如果巴黎街头流行红裙子，三个月后，东京街头就会流行红裙子，一年之后，上海街头也会流行红裙子，再过一年之后，青岛街头才会流行红裙子，等青岛街头流行开红裙子时，巴黎街头早就流行了蓝裙子之后又流行黑裙子了。但现在呢，巴黎街头昨天流行红裙子，今天在上海街头就可以看到红裙子了。甚至还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因为上海流行了红裙子，所以东京、巴黎的街头上也流行了红裙子。现在，许多城市的面貌越来越像，前几天我从德国到香港再到首尔，看到年轻人的服饰几乎一样，不但是服饰相似，似乎连他们脸上的表情也都是同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以依赖个性而存在的文学艺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我们要抵抗，但这抵抗是没有结果的，就像各国政府抛出的救市招数并不能遏制股市的下跌一样，文学家与艺术家的抵抗，也不能阻止越来越多的艺术克隆和近亲繁殖。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和美国电影越来越像了，越来越多的美术和雕塑作品分不清国籍了，国际上流行的小说，也越来越像用统一配方调制出来的流行饮料了。

这其实不是一个新问题，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这其实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问题。就像我们不能因为眼下的经济危机而重新闭关锁国一样，文学艺术的趋同化，也不应该成为中国的作家、艺术家拒绝与外国的同行们交流的理由，更不应该成为中国的作家、艺术家拒绝向外国的同行们学习的借口。我认为，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是应该以更开放的心态、更积极的态度、更高的热情和更大胆的手段，去与外国的同行们交往，去向外国同行们学习和借鉴。但我们这个时期的学习和借鉴，与一九八〇年代相比，应该有更高的水平，因为我们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实践，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当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绩。如果说八十年代我们跪在外国同行们面前仰视他们，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也完全应该与他们坐在一起谈话，与他们站在一起交谈。当然有很多朋友对我们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作品评价很低，我个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我尊重他们的看法。

对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评价很低的朋友们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这个时期的文学，由于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而缺少原创性。我认为，文学是否有原创性，与作家是否

受到西方文学影响并无直接关系。蒲松龄、曹雪芹大概是没有受到外国文学影响的，据目前的资料所示，这两个人似乎也不懂外语，曹雪芹肯定懂满语，但那时已经是满族人在做皇帝，满语能不能算外语还值得研究。但鲁迅他们这一代作家，大都是懂得外语且明显地受过外国作家影响的。鲁迅的早期小说，有几篇分明地可以看出他借鉴的外国小说，但我们似乎不能以此为理由来否定鲁迅小说的原创性，即便是有明显借鉴痕迹的篇章，如《狂人日记》等，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原创性吧？因此，我们不必那么惧怕外国文学的影响，也没有必要把受到了外国文学影响当成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当然，认识到这一点，对我本人来说，也有一个过程，八十年代后期，我也很忌讳别人说自己受到了外国作家影响的，我当时在《世界文学》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出要逃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这两座灼热的高炉，我说他们是灼热的高炉，而我自己是冰块，靠得太近，自己就会被融化蒸发。近年来我的想法有了变化，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焦虑，马尔克斯是人，福克纳也是人。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之所以成为名家，自然是因为他们写出了具有鲜明个性的、具有原创性的作品，但他们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与他们广泛地、大胆地向同行学习、借鉴是分不开的。马尔克斯多次讲过卡夫卡和福克纳对他的影响，他奉福克纳为自己的导师，他在巴黎的阁楼上读到卡夫卡的《变形记》拍案而起的故事，早已被各国的作家们所熟知。可见，受不受外国作家影响，似乎不应该成为判定一个作家水平高低的标准，甚至可以说，在当今的情况下，如果要写出有个性、有原创性的作品，必须尽可能多地阅读外国作家的作品，必须尽可能详尽地掌握和了解世界文学的动态。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我们也不排除出现一个新时代的蒲松龄的可能性。

高明的作家，是能够在外国文学里进出自如，只有进去，才能够摒弃皮毛，得到精髓，只有跳出来，才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利用自己掌握的具有个性的创作素材，施展自己独特的才能，写出具有原创性的作品。沈从文自己好像没有说过受哪个外国作家影响的话，但他对于外国文学肯定是不陌生的，尽管他不懂外语，但翻译作品肯定还是读了不少的，但他的小说和散文，无论从语言还是从素材，以及他在这些作品里呈现出的他对于人生和社会的看法，都是具有个性和原创性的。他的学生汪曾祺先生八十年代初期的作品，呈现出十分鲜明的个人风格和中国特色，根本看不出外国文学的影响，但汪先生自己说：“我是从契诃夫、海明威、萨拉杨的语言中学到一些东西的。”受到影响而没在自己的作品里留下痕迹，这就是高手。而为什么有人受到影响留下了痕迹，而有人

受到影响却没有留下痕迹呢？我想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高明的作家之所以能受到外国文学或者本国同行的影响而不留痕迹，就在于他们有一个强大的“本我”而时刻注意用这个“本我”去覆盖学习的对象。这个“本我”除了作家的个性和禀赋之外，还包含着作家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感悟，就在于他们是被别人的作品，唤醒了自己的生活。这样，他们的创作灵感尽管是被同行的作品所启发，但这道灵光照亮的是他自己的生活的。这归根结底还是从生活出发的创作，是被生活感动了自己然后写出来的，而不是克隆别人的作品然后试图去感动别人。

另外，高明的作家，不会跪拜在外国同行的脚下，把他们作品中的一切都当成珍宝。真正的学习是批判地学习。无论多么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中也有不完美之处。八十年代时我们是从外国文学里寻找优点，现在，应该是从外国文学里寻找缺点。找到他们的缺点，就意味着我们的进步。八十年代中期时，我读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只读了几页，便按捺不住写作的冲动。后来这本书被我经常拿来读，但一直没有读完。直到去年的六月，因为知道今年二月很可能要与他在一个会议上见面，所以我用两个星期的时间，把这部书从头至尾通读了一遍。读完全书，我感到一阵兴奋。因为，我看到了这部被封为经典的作品里，也有明显的缺点。这本书有二十章，但写到十八章时，作家的底气已经衰竭，后边的两章，几乎可以说是敷衍成篇。我自然不是高明的作家，但我从读出了马尔克斯的不足，意识到了自己的进步。

汪曾祺先生在一篇关于京剧的文章中写道：“文学史上有一条规律，凡是一种文学形式衰退了的时候，挽救它的只有两种东西，一是民间的东西，一是外来的东西。”文学艺术的趋同化，也可以理解成为一种衰退，我们应对衰退的，也只能是这两件法宝。关于向外国文学学习，我已经大概地表述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是要更加自觉、更加大胆地“拿来”，但“拿来”之后，我们要认真地研究分析。我们要学习和借鉴的是属于艺术的共同性的东西，那就是盯着人写，贴着人写，深入到人心里去写；我们要赋予的，是属于艺术个性的东西，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风格。什么是我们的风格？我想那就是由我们的民族习惯、民族心理、民族语言、民族历史、民族情感所构成的我们自己的丰富生活，以及用自己的独特感受表现和反映这生活的作品。

汪曾祺先生对“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我想这话本身也没有错。但如果把这个口号引申到民族自大的意义上，把追求或者伪造奇风异俗、逐

臭猎奇当成了民族化，那就确实错了。

总之，不大胆地向外国文学学习借鉴，不可能实现文学的多样化；不积极地向民间文化学习，不从广阔的民间生活中攫取创作资源，也不可能实现文学的个性化、民族化、多样化。

《当代作家评论》二〇〇九年第一期

中日作家鼎谈

铁 凝 大江健三郎 莫 言



编者的话：为出席“二十一世纪最佳外国小说奖”颁奖仪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名誉研究员大江健三郎先生于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五日至二十日访问了北京，抵达北京的翌日晚间，便在外文所所长陈众议教授等人陪同下，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和作家莫言等友人欢聚一堂。现由大江健三郎文学的研究者和翻译者许金龙教授将这三位作家的谈话翻译并整理出来，以供我们的读者欣赏和参考。

恰巧套在树枝上的红宝石戒指值多少法郎？

铁凝：热烈欢迎您，大江健三郎先生，今天上午，我和莫言先生、众议先生以及金龙先生刚刚出席了您的颁奖仪式，晚上就又见到了您，这让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大江健三郎：我也很高兴，最近这段时间，我和妻子一直在读《大浴女》日译本。在从机场进入市区的路途中，我就对前来接我的陈众议先生和许金龙先生说起了《大浴女》。这部作品描绘了几位女性的群像，叙述了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到九十年代这二十多年的历史。在这二十多年的过渡期里，尤其是七十年代初那段时期，人们的生活比较困苦，你的作品表现了那几位女性如何怀着希望为超越苦难而进行奋斗的历程。我认为，围绕一个女性群像进行写作的手法在日本的作家里不曾出现过，即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不多见的。我记得这部作品发表于一九九九年，是上个世纪末发表的作品，到目前

已经十年了，如果让我在世界文学范围内选出这十年间的十部作品的话，我一定会把《大浴女》列入其中。

铁凝：这让我实在不敢当。

大江健三郎：作品里的女主人公尹小跳的恋人是一位电影导演，那位导演托唐菲转送给尹小跳一枚红宝石戒指，尹小跳将那枚戒指随手往脑后扔去，却恰巧套在一株法国梧桐的树枝上。在日译文本中，唐菲惊诧地问道：你干什么哪你！那是白金和红宝石的，肯定花了他好几个法郎。我觉得这一处有点儿不自然，在中国，应该说是几元，即便是法郎，由于戒指比较贵重，那也应该是几千法郎而不是几个法郎。

莫言：是否将克拉误译为法郎了？

铁凝：戒指上是有红宝石，我的原话是“肯定花了他不少法郎”，表示那是一个挺值钱的宝石戒指。原文并未具体写多少法郎，也没说克拉，译者可能是对应转译了一下。不过我很吃惊，没想到大江健三郎先生读得这么仔细。

大江健三郎：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

铁凝：我的原文肯定不是克拉，也不是几个法郎。

大江健三郎：回到日本后，我立即给译者写一封匿名信，对，是匿名信。我告诉他，在北京，铁凝女士用非常好的葡萄酒款待了我，在交谈期间，我曾向铁凝女士请教：《大浴女》中那个戒指不是几个法郎，而是“不少法郎”吧？请你调查一下。我会在信中这样告诉译者的。这个译者是中央大学的教授，叫饭冢容，对《大浴女》翻译得非常出色。

莫言：大江健三郎先生读书太认真了！现在很多人都缺少这种认真精神。

大江健三郎：我借助法文、英文和日文阅读了莫言先生被翻译为这些文种的所有作品，在这过程中呀，曾数度给译者写去信函，写的也是匿名信。莫言先生的日译本有两个主要译者，一个叫作藤井省三，是东京大学的教授，另一个叫作吉田富夫，还是藤井先生翻译得比较好。另一位译者翻译了莫言先生的很多作品，他是大阪那边的人，我对他的翻译存有疑问。每当莫言先生新的日译本出版时，我就进行调查，最终还是认为藤井先生的翻译“真好呀”。莫言先生是一个非常宽容的人，对译者不怎么说起这个问题吧。

莫言：您这样给译者写信，有的译者会很高兴，而有的译者恐怕会不高兴的。

铁凝：这就是茴香豆，众议先生告诉我，您每次来中国都会说起茴香豆，刚才来这里的时候，您还在楼下孔乙己铜像前对着孔乙己手中的茴香豆看了很长时间……您是否

先试试南非的这个酒？最近智利和南非这些国家生产的葡萄酒在中国开始受到欢迎。今天这里没有外人，只有这几个好朋友，我们首先要祝贺您的新作《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获得“二十一世纪最佳外国小说奖”。听说，这是日本小说作品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

大江健三郎：谢谢你！

铁凝：在宴会开始前，我就已经和大江健三郎先生约好了，这个酒即便不好，先生也得假装说好（笑）。

大江健三郎：这个酒确实不错。这次回到日本，我对媒体可有值得夸耀的话题了，我要告诉媒体的记者，我在北京喝了与两位优秀女作家有关的葡萄酒——在优秀女作家铁凝女士那里，喝到了优秀女作家纳丁·戈迪麦女士所在的南非这个国家的葡萄酒（大笑）。

铁凝：现在中国好像与南非在葡萄酒方面有着合作，国内一些企业在智利和南非购买了一些酒庄。对了，我知道先生爱喝啤酒，我们还应该要一点儿啤酒。请问您喜欢哪一种啤酒？

大江健三郎：这个葡萄酒已经很好喝了。

铁凝：那是不一样的。就喝北京当地产的燕京纯生吧，您是要冰镇的还是要常温的呢？如果要冰镇的话，您的胃没问题吧？这个季节还是常温的更合适一些。

大江健三郎：那就要常温的吧。

铁凝：我并不是在强迫您（大笑）。

大江健三郎：我还是想把话题转到你的作品《大浴女》上来。尹小跳、唐菲和孟由由这三个主人公呀，她们在孩童时代，孟由由曾做过一桌美味的菜肴，这是她们的第一次宴会。第二次聚餐时，唐菲患了癌病，她们三人又聚在一起，还是由孟由由来烹饪当年那些菜肴，这个场景非常美好，也是我最喜欢的场景。这些女孩子没有喝酒，她们以水代酒，这里的描写非常好。

莫言：上午参加颁奖大会时，先生在纸上写了这三个女孩儿的名字，原来是在说《大浴女》的主人公，当时我还在纳闷，难道先生要请这三个女孩儿参加晚上的宴会？（大笑）

铁凝：我还带着先生写的那张纸呢……

莫言：当时，先生写了尹小跳等三个女孩儿的名字，还写了宴会等字样，我就在想，或者这三个女孩儿晚上要来吃饭或是签名什么……

铁凝：那三个女孩子是我小说里的主人公，在中国“文革”后期物质生活比较匮乏的时代，她们自己花一块钱办了一桌宴席，油炸肉皮呀什么的，在那儿讲吃讲穿……这就是大江健三郎先生上午为我写的，他给我写了一个人物表，最后我说，你把这个送给我吧，他就盖了一个章，盖了一个他自己的章。你看，他写道：我喜欢你设计的“文革”中三个少女的那场宴会，二十年后，她们又聚在一起……当时坐在会场上就给我写了，是在上午的颁奖会场上写的。

大江健三郎：那其中有一段说的是她们在少女时代吃过的非常美味可口、现在无法买到也就无法吃到的酱兔头，是煮过的那种。我妻子读了这一段后，就对我说呀，这几位少女在孩童时代吃过酱兔头，成年之后还想再吃一次，却买不到，弄不到手，看来是很好吃的东西。我就对妻子说，至今我已经去过中国五次了，曾经吃过几次那种酱兔头。妻子便问道，真的那么好吃吗？我回答道，是一面走一面吃的，酱兔头耳朵上面沾着筋肉，那部分非常好吃。妻子就说“我估计也是那样的”。我接着告诉妻子，一九六〇年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总理在全聚德招待我们时说，这个酱兔头我们请谁来吃？大家就说请毛泽东主席吃。于是妻子“啊、啊”地为之惊叹不已。此时她已经读了《大浴女》，就说作品中这一段也写着耳朵那里的筋肉美味可口，而且也是一边走一边吃的。

铁凝：日本人也爱吃酱兔头吗？

大江健三郎：不吃（大笑）。

铁凝：那您在中国吃的时候没觉得害怕吗？

大江健三郎：我是读了你书中的情节后想象出来的，实际上并没有吃过，只是被妻子那么询问后，便空想出那段话，告诉妻子我自己也吃过。不过，一九六〇年夏天，周总理确实在王府井的全聚德烤鸭店宴请了我们日本文学家代表团，只是每张桌上出现的不是酱兔头而是烤鸭头，是从中劈成两半的鸭头。当时赵树理先生和我在同一张桌上，他就问大家：同志们，朋友们，我们桌子上只有一个鸭头，我们该请谁来吃呢……

铁凝：不过酱兔头确实挺好吃。那个时代，人民币只要三分钱就可以买一个，好香啊！

大江健三郎：是啊，书里说只要三分钱。应该非常好吃。

莫言：有一年，我们去浙西衢州那地方，当地有一个县，那里专门烧兔头，吴仪副总理去了后连吃三个（笑）。吃的时候只要不联想起小白兔就行了。

铁凝：我现在想介绍一下最后来的这位客人。大江健三郎先生，这位女士是《文艺报》的记者，这家报纸是中国作家协会自己的报纸，她的文章写得很好。

大江健三郎：我知道这家报纸，就是刊载着我在名古屋与奥尔罕·帕慕克先生对谈文章的那家报纸，我现在就带着那份《文艺报》，是许金龙先生翻译的，那上面还有我的照片。

铁凝：先生昨天晚上刚到北京，不可能是您来之后发的，应该是在您来北京之前发的，因为不可能出这么快呀……啊，果然是二〇〇八年九月六日的报纸。

大江健三郎：在这份报纸另一个关于菜肴的页码上，登载着有关酱兔头的文章（笑）……

助产医生寒夜里冲过冰冻的大河——“这个场景让我非常喜欢”

大江健三郎：莫言先生，你目前在写新的小说吗？

莫言：没有，最近没有写大的小说。

大江健三郎：前不久，日本出版了你的《生死疲劳》日译本……

莫言：那是六年前写的作品，目前已经有大约三年没怎么写小说了。

大江健三郎：《生死疲劳》也是以你的故乡为背景创作的小说，非常出色。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我经常回忆起二〇〇二年春节前往高密访问你老家时的情形，当时，你的姑妈面对我们讲述她一生的经历，我和你就是两个小学生，而她则是老师，在为我们两个小学生讲课。她说起自己是接生婆……

莫言：那时叫赤脚医生，主要是为产妇们接生……

大江健三郎：对，听说几十年来，她把成千上万的孩子迎到这个世界上来，同时为了计划生育扼杀了更多的小生命。她现在身体还好吗？

莫言：她的身体不但好，而且非常好。两年前，有一个中年男人激怒了她，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太清楚，姑妈上前就是一拳，把那个中年人的眼睛打成了熊猫眼。当时她已经是七十三岁的老人了，还有那么大的力气和火气（笑）……

大江健三郎：不过莫言先生，你目前正在构思小说吗？正在思考吗？

莫言：构思倒是一直在构思，不过，这几年在外面跑得太多，时间都给分散了。必